

近30年来西方汉学学者 关于中国古代“大一统”的争讼

金方廷

[内容摘要] 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政治观念和格局历来是西方汉学家相当关注的问题。一直以来西方汉学家对这一问题缺乏共识，然而总结最近30年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古代“大一统”的研究和讨论，仍能看出其中呈现出一些鲜明的时代特点，而对于具体问题的讨论又往往折射出西方人文学界近30年整体的思想演变。本文对近30年中西方汉学界围绕中国古代“大一统”问题最具代表性的几种观点进行总结与评述，通过对这一案例的系统观察，探索西方汉学界研究、解读中国政治传统的基本思维方式和研究路径。

[关键词] 大一统；西方汉学；中国政治传统；中西比较研究

在历史上中国长久地维持着被称为“大一统”的政治形态，对中国古代“大一统”的讨论自然而然地成为西方汉学研究中争议颇多的议题。西方学者对这个议题的论争首先体现在语词的翻译上。在英语学术界，中国古代的“大一统”“统一”就有着好几种不同的英语翻译，其中西方学者最常用的英译词是强调整体性的“unification”和“unity”，有时也有学者会用“centrality”来表达对“中央集权”的强调，而知名汉学家葛瑞汉（A. C. Graham）使用的词则是“integration”。可以说学者对“大一统”理解的差异从翻译语词的选择中便可见一斑。^①

与许多中国学者悉心辨析《公羊传》中的“大一统”意涵不同，海外汉学学者对于“大一统”的讨论更接近于解释中国历史上作为国家形态和思想观念的“统一”，而比较近于近代梁启超和吕思勉所讨论的大一统的“国体”问题。^②于是汉学家试图解释的“大一统”问题，就变成了对中国古代国家观念和政治思想的研究。与“大一统”形成对照的则是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割据和分裂状态，因此秦统一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以及“五胡乱华”之后的南北朝时期，时常成为汉学家探讨“大一统”问题的历史参照。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着重关注近30年来西方汉学界涉及中国“大一统”问题的相关讨论，^③主要以先后发表于《通报》（*T'oung Pao*）上的三篇论文为主：薛爱华的《邶中记》^④、鲁惟一

① [英] 葛瑞汉：《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张海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② 方卿：《专制与秩序——大一统国家形成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第9页。

③ 在此将不会探讨日本学界或中国学界的研究，虽然日本学者对这一问题同样抱有极大关注，如手塚良道：〈春秋公羊伝の義理としての大一統主義に就いて〉，《東洋大學紀要》第14輯，1960年；[日] 谷中信一：〈戦国時代後期における大一統思想の展開〉，《日本中國學會50週年紀念論文集》，東京：汲古書院，1996年版，第1303—1320页。

④ Edward H. Shafer, “The Yeh Chung Chi”, *T'oung Pao*, Vol. LXXXVI, 1990, pp. 147-207.

的《从中华早期帝国所见中国之统一观念》^①，以及尤锐的《古代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以一概全”：“大一统”范式的源头》^②。同时我还将参考鲁惟一在编著《剑桥早期中国史》一书时就相关论题所做的阐发^③，以及近年来在研究早期中国历史方面颇为活跃的年轻学者许田波对这一问题的讨论^④。

薛爱华、鲁惟一和尤锐尽管都是西方汉学界的重要学者，他们各自擅长的领域和接受的学术训练却各有偏重。不妨引述柯睿(Paul Kroll)的话来概括薛爱华在汉学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薛爱华是)以往40年美国中古中国研究的同义词”。鲁惟一则是当今汉学界秦汉史研究的执牛耳者。较年轻的学者尤锐和许田波尽管同样专注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但两人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观念差异甚大。尤锐更接近于中国传统史学的立场，相比之下许田波没有受过汉学方面的训练，却时常使用先秦时期的史料作为她研究国际政治问题的素材，而她本人也深受现代国际政治理论的影响。专攻领域和学术训练的差异导致这几位学者彼此对“大一统”问题的理解截然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不约而同地从自身的西方历史文化背景来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于是这几位学者选择以何种西方历史文化的背景来“对标”式地揭示中国的“大一统”，也就成为本文尤为关心的问题。

一、薛爱华：“大一统”是一种“虚构”

薛爱华是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中古时期的重要学者，他的《邺中记》发表于1990年。这篇文章从标题看似与此处谈论“大一统”的论题相距甚远，但考虑到许多西方汉学学者（如本文稍后将要讨论的鲁惟一和尤锐）在讨论“大一统”问题时均提及了这篇论文，可以说这篇文章为近30年来西方学者探讨“大一统”问题奠定了基调，因而薛爱华在文中表露出的对于“大一统”的理解在学术史视野当中就显得相当关键了。

薛爱华在《邺中记》一文中首先提出了一种关于“中国”的耐人寻味的表述：Chinastan。^⑤正如前文谈到的那样，如何遣词造句本身亦是学术思想的重要部分。对此薛爱华是这样解释的：

Chinastan 这一名称从语言学上说是一个带有异域风情的奇想，它可以让人联想起其他一些诸如“Hindustan”和“Turkestan”那样暧昧而又传统的称呼，在此我提议使用 Chinastan 是为了强调这一点：我所指的，绝非那个我们以为是“中国”的变化纷呈的领域内，其现实居民所承认的那个特定的政治实体。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撇清“China”一词同任何时期所谓“特定的政治实体”的关系外，“Chinastan”在西域同“China”一样也是异国人对“中国”的泛称。因而这个语词从一开始就带有解构“中国”的意义在内，并且薛爱华也特别强调了 this “Chinastan” 背后的“异域”视角。

① Micheal Loewe, “China’s Sense of Unity as Seen in the Early Empire”, *T’oung Pao*, Vol. LXXX, 1994, pp. 6-26.

② Yuri Pines, “‘The One That Pervades the All’ in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Unity’ Paradigm”, *T’oung Pao*, Vol. LXXXVI, 2000, pp. 280-324.

③ Micheal Loewe, “The Heritage Left to the Empires”, in Michea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031-1032.

④ Vitoria Tin-bor Hui (许田波), “War and Historical China: Problematizing Unification and Division in Chinese History”, *EAI Working Paper Series VII (2007)*, http://www.eai.or.kr/data/bbs/eng_report/20090521128690.pdf.

⑤ Edward Shafer, “The Yeh Chung Chi”, pp. 147-148.

在此基础上，薛爱华进一步指出：“中国 (China)” 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一个“神话” (myth)、一个不存在的“幻想” (“non-existent chimaera”) ^①，正如欧洲也同样时而统一、时而分裂那样，“中国”这个概念并不比“欧洲”更具启发意义或更具成效。^②所以在薛爱华看来，“中国”这个概念同“欧洲”一样都只能充当地理意义上的术语，在他的理解中，“中国”和“欧洲”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它们在历史上历来都是四分五裂的 (fragmented) ^③。

显然薛爱华对于“大一统”的认知存在很大的偏颇。需要指出的是，薛爱华的这一表述主要基于“五胡十六国”时期的中国历史。^④聚焦于这个中国历史上颇为特殊的时期，薛爱华看到的是“五胡乱华”以后的中国北方地区：“在远东（特指 Chinastan），某一个‘秦’国被苻氏王朝所统治，还有一个‘夏’国受到赫连王朝的管辖，同时还有一个名为‘代’的早期突厥王朝。”因而薛爱华之所以认为中国历史历来是“四分五裂”而非“统一”的状态，与他选定的历史时期“样本”有很直接的关联，他没有注意到“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格局绝非中国历史上的常态。

除此之外，薛爱华的观点还必须放置到 1990 年代初的西方学术界大环境中去理解。将包含各类跨种族、跨地域的统一政治体视为一种“幻想”或“虚构”的观点在 1990 年代初的西方学术界相当流行，这种学术思潮或多或少地影响了西方学界对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在观念和事实层面的理解。尤锐就曾深刻地指出，在苏联解体等一系列事件之后，不少研究现代中国的西方学者相信，苏联短祚的覆辙将会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反复上演，这种悲观的观望态度很可能影响了像薛爱华这样的汉学家。^⑤另一方面，1980 年代在美国人文学界流布深远的“后现代”史学观，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学者们开始全盘怀疑和否定“大一统”“统一”等整体性宏观叙事，杜赞奇 (Prasenjit Duara) 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大作《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就是这种新学术思潮的有力证明。^⑥

尽管薛爱华只是简短地提到了对于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认识，然而他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是一个“神话”、一个不存在的“幻想”的观点在西方汉学界仍影响深远。至少，纵览近 30 年西方汉学界的相关讨论，汉学家们基本倾向于从较为负面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和“统一”，从中明显可以看到后来的汉学家在这一问题上对薛爱华观点的延续和深化。

二、鲁惟一：探讨“大一统”的价值

前文提到，使用 Chinastan 这个语词表露出薛爱华对于历史上“异族”如何看待古代中国抱有强烈关注。在鲁惟一带有强烈韦伯烙印的论文《从中华早期帝国所见中国之统一观念》

^① Edward Shafer, “The Yeh Chung Chi”, p. 148.

^② Ibid.

^③ Ibid.

^④ Ibid., p. 149.

^⑤ Yuri Pines, “‘The One That Pervades the All’ in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Unity’ Paradigm”, p. 320.

^⑥ 为此可以参考张仲民：《解构中国民族历史叙述的尝试——读杜赞奇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一书》，载《历史研究》，2006 年第 5 期，第 178—185 页。

中，^①先秦秦汉时期的中国人如何看待和处理异族同样是作者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②

鲁惟一这篇重要的论文首先梳理了早期中国产生统一观念的思想基础，之后又论述了帝国早期为了达成这些理念所采取的手段。^③可以注意到鲁惟一在文中委婉而又微妙地回应了薛爱华的观点，但与薛爱华不同，鲁惟一没有试图去讨论“大一统”是否是中国历史的常态，而是视“大一统”为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民族特性”（characteristics）的必然结果。所谓“民族特性”指的是：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确信地认定某些表现为不同形态的民族特性，这些特性奠定一个民族的宗教活动与艺术作品的本质特征，构成他们风俗习惯的基础，并让那些充满活力、无可抑制的元素遍布其文学和传统之中。^④

于是在鲁惟一的归纳体系中，中国人的“民族特性”以及中国人对自身的认识由三个部分组成：统一的宇宙观、等级观念和对“中心”（centrality）的追求。他认为正是这三者共同促成了“大一统”观念的形成。鲁惟一与薛爱华不同，在他看来，早期帝国时代的“大一统”并非仅止于单纯的观念^⑤，更是秦汉帝国时代政治治理所力图实现的现实目标之一。因而“大一统”就不是薛爱华所认为的“想象”和“虚构”之物，而是从中国早期帝国时期就已经真实存在着的历史功绩。

然而与此同时鲁惟一却又着重强调古代中国在“大一统”的“观念”同其实际作为之间存在着悖论。他最为关心的是，中国人“要一再地在严酷的事实面前”认识到自身能力的局限性，特别是在同外族的对抗中。鲁惟一说：

可以这样说，当统一的理念（idea）或理想（ideal）从中国人对非华夏族群的态度那里汲取了力量时，中国人的实际举动却又在部分地妨碍着这一理念或理想；并且当等级观和中心观促使中国人将“他者”（others）恰当地置于这一统一体之中时，中国人在文化价值上的自尊心又阻碍了他们在平等的层面上完全接纳这些外族。^⑥

不少学者都曾经谈到，中国古代“大一统”观念源于外族的影响。如日本学者谷中信一就详细分析过，先秦时代夷狄对中原诸侯的紧张关系是使得“大一统”观念得以孕育的原因之一，并且他还指出华夷之间的战争使得“大一统”理论本身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⑦然而与之相比，鲁惟一更深入地辨析了“大一统”的意义和价值问题。鲁惟一毫不客气地指出“统一观”在中国早期帝制时代的诸多矛盾之处，试图以此证明，“大一统”观念对于华夏内部的融合也并非可靠而必需的东西。这个想法到了鲁惟一撰写《剑桥早期中国史》相关篇章时则表露得更加直白

① 关于鲁惟一本文同社会学理论的关系，更重要的证据来自此文的第一个注释，其中提到此文写作受到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的帮助，而希尔斯正是精通韦伯研究的著名社会学家。见 Micheal Loewe, “China’s Sense of Unity as Seen in the Early Empire.” p. 6. 在此有必要说明的是，本文曾有过一个中译本，见于陈致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上古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27—348页。我发现这篇译文中有不少翻译得未必准确的地方，在这篇论文中用的都是我自己的翻译。

② Micheal Loewe, “China’s Sense of Unity as Seen in the Early Empire”, pp. 8, 9, 20, 23.

③ Ibid., pp. 7, 13.

④ Ibid., p. 6.

⑤ Ibid., pp. 12-13.

⑥ Ibid., p. 20.

⑦ [日] 谷中信一：〈戦国時代後期における大一統思想の展開〉，《日本中國學會50週年紀念論文集》，第1307—1308页。

和明确：

从中可以提出许多问题，关于那种中国统一较之政治单元的多元更能贡献于人民之福祉的观念的追问仍旧有待回答。有关宫廷密谋、尔虞我诈的传闻，以及帝国历史每一页中一再上演的暴力，这一切都是如此频繁地上演着，以至于我们很难承认“帝国的存在切实促进了人类的和平”这一未经修正的结论。^①

对比薛爱华所谓的“不存在”、“幻想”的“大一统”，鲁惟一所揭示的是“大一统的徒劳无功”。也就是说，他一方面认定“大一统”在历史上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却又深深质疑“大一统”在观念层面上的意义。^②不过简单对比薛爱华和鲁惟一的话，可以很容易看到二者的共同之处都是默默地将欧洲作为参照系来比对中国。^③在西方历史的参照之下，薛爱华相信中国和欧洲一样并不存在所谓的“大一统”，鲁惟一则怀疑中国文明中此种“大一统”的价值。若非同西方现有的政治体相比较，只怕是很难单纯从中国历史本身得出这样的结论。

三、“大一统”之为理性策略抑或极端的恶

在此笔者愿意将尤锐和许田波对于“大一统”问题的看法放在一起作为对比。这两篇文章同样聚焦于先秦时期作为探讨“大一统”问题的历史背景，但是两位作者对于“大一统”的认识和理解却走向了截然相反的方向。

于是此处关心的问题就变成了：为什么尤锐（Yuri Pines）和许田波聚焦同样的历史时段（春秋战国时期）却得出几乎完全相反的结论？简单梳理两人关于“大一统”和“统一”问题的代表作，最终影响学者得出关键性结论的因素取决于观察历史的视角。或许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尤锐的文章是最容易读的一篇，这篇论文相比之下更接近于普通中国学者对于“大一统”问题的理解，这或许与他曾经在中国高校接受学术训练有关。尤锐在文中指出，“大一统”首先是一种孕育于分邦割据之“无政府状态”的理性政治策略。^④尤锐梳理了春秋战国时代对所谓“国际秩序”的“无效寻求”^⑤，他根据对这一历史时期的观察，发现无论是制度改革、国际道德规范抑或是霸权的行使，均无法在割据的国家之间达成一种稳定的国际体系，因而在长期的分裂和内耗之下，一种“统一即稳定”的观念在这样的历史局势下应运而生。^⑥除此之外尤锐受到葛瑞汉的影响，他非常强调“天下”观念在这一思想史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为此他在文中逐一梳理了先秦时代诸子百家对于“天下一统”的关注，从而在观念的层面解释了先秦时代的中国人的“大一统”观念：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那种分裂状态必将导致霍布斯（Thomas Hobbes）式的“自然状态”（state of

① Micheal Loewe, “The Heritage Left to the Empires”, pp. 1031-1032.

② Micheal Loewe, “China’s Sense of Unity as Seen in the Early Empire”, pp. 612-613, 623. 有鉴于此，鲁惟一从早期帝制时代中国人的“统一观”（包括其如何实现这种“大一统”观念的实际作为）出发，事实上仍旧回到了“民族特性”的主题上，或许在他看来，“大一统”的观念同民族特性息息相关。

③ 除了欧洲之外，另一个隐含的重要参考或许还有美国的联邦制。然而作为一个不允许州脱离合众国的政治共同体，尽管保留了各个州相对的自主性，美国从宪法层面就杜绝了分裂的可能。

④ Yuri Pines, “‘The One That Pervades the All’ in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Unity’ Paradigm”, p. 282.

⑤ Ibid.

⑥ Ibid., pp. 298, 300-315.

nature），并最终必将陷入一种“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the war of all against all”），这种频繁战争状态并不符合古代中国人对政治福祉的期待。

尤锐重申传统中国的历史观念和政治文化，还试图为这种传统观点提供新的论证，然而他的观点和立场在一众汉学家中显得如同“异数”。尤锐的文章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文化语境做了比较详细的还原，然而正如有的学者评论的那样，尤锐探讨“大一统”问题将视角集中于战国时期，却忽视了最终实现“统一”的却是施行法家之术的秦国。^①

于是尽管许田波同样把讨论“大一统”问题的历史语境放置在前秦，不同学者对这一时期历史的关注点却很不相同，相比之下许田波显然更关注秦国，正因如此，对“武力”（force）的强调也成为许田波文章的突出特点。许田波文章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她在讨论中国古代的“统一”问题时异常频繁地援引学术界对“民族国家”观念的批判。一方面许田波参照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一书中对于民族国家（尤其是德国）的判断，认为代表了统一政治体的“中国”仅仅是一个诞生于19世纪晚期的现代概念，由此质疑所谓的“统一”和“大一统”观念在古今的连续性。另一方面许田波从国际政治理论入手比较了春秋战国时期和近代西欧的历史，特别剖析了历史上作为稳定繁荣前提的“大一统”观念。有趣的是，许田波在试图批判经由民族国家叙事被强化的“大一统”观念的同时，最终却给出了一份极端西方中心主义的答卷。她似乎过分单纯地认为，既然分裂状态下的西欧国家的国际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西方近代的自由、繁荣和兴起，那么在数个世纪内孕育了大量国际盟约的春秋战国时期或许也能成为诞生公民权和国际贸易的历史土壤。

这样的观点很难让人接受。在她的研究中，西方历史在有意无意间成了她理解和评判中国历史的模板，可是她的中西比较研究不仅缺乏深度且充满偏见，甚至也无法苛求历史的客观性。许田波自称“追随鲁惟一的建议”并对中国历史上的“统一”观念加以质询，可只需与鲁惟一对秦汉时期“大一统”的书写进行对比便能看到，实际上许田波更多地承接了薛爱华的观点——她同样错误地认为“分裂”才是中国历史的常态。她不仅从“事实”层面否定“大一统”在历史上的存续，也质疑“大一统”的“价值”。因为在她看来，只要“统一”和“大一统”的过程中动用了暴力，那么这种“统一”本身就是可疑的。^②然而既然不动用暴力是不可能的，那么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统一”在许氏看来无非就只是无止境的“压迫与压制”。^③

由此可见，许田波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政治的整体看法都非常负面，这种整体性的负面理解使得她理解的“大一统”看起来相当偏颇。照她的理解，中国历史同样不过是介于“无政府状态”和“独裁”之间的往复循环。^④尽管许田波声称追随鲁惟一的思路继续探寻“大一统”问题，然而在她的表述中，在鲁惟一看来显得徒劳的“统一”却被夸大成了一种“罪恶”。^⑤这样的描述显然过于夸大，既不符合历史现实，也很难将之看成一种公允的历史评价。

① Vitoria Tin-ber Hui（许田波），“War and Historical China: Problematizing Unification and Division in Chinese History”，pp. 15-16.

② Ibid., p. 16.

③ Ibid., p. 39.

④ Ibid.

⑤ Ibid., p. 40.

对比许田波和尤锐的论述，便可看到相比尤锐对中国历史和政治传统的同情之理解，许田波则特别依赖西方历史和理论来建构她对于古代中国的观点——麻烦的是，当西方的理念几乎压倒了中国的事实的时候，势必会削弱比较研究本身的价值。即便在针对对中国历史的全盘负面理解提出所谓的“救赎”之道时，她也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西方中心主义态度，因而她颇为可笑地相信唯有美国式的民主和联邦政府才是解决一切中国传统政治问题的最佳选择。或许对于在西方接受学术训练的学者来说，基于西方的历史经验和理论视角探讨中国历史本身无可厚非，然而有些学者的问题在于，他们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政治传统看起来缺乏深入了解的意愿，再比照他们对西方政治制度完全不假思索的拥护态度，使得这类学者的观点非但难以深入学术问题的肌理，也体现不出对于历史上的政治问题有什么深入的洞见。

由此回到尤锐的观点，他列举战国时期的历史证据表明，“统一”对于战国时期的人们而言不仅是一种理念，而且也是一种历经几个世纪无休止战争之后的共同选择，不过他更关注的是“大一统”如何从思想、理念最终成了现实，也就是说，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古人把这样一套政治理念付诸现实。在这个意义上他恰恰委婉地回应了鲁惟一在此前提出的问题：正是因为战国时期已经见证了分裂战争的诸多恶果，“大一统”的帝制才最终成为古人追求“政治福祉”的终极答案。

四、总结与讨论

综上所述，或许可以如是概括上述西方汉学家的观点：薛爱华认为“统一”乃是虚妄之言，鲁惟一却质疑历史上“大一统”的现实意义；对比一些学者将统一视作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原罪”之一，尤锐则相信统一帝国乃是面对长久战争之后的“理性政治方案”。

归结起来，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大一统”问题的追寻无外乎两个核心问题：“是否存在所谓的‘大一统’”以及“为什么要追求‘大一统’”。西方学者围绕这两个问题的说法各有千秋，从中清晰体现了学者们所接受的不同学术训练和彼此迥异的观点立场。薛爱华只是表达了对“大一统”问题的基本看法，然而读者从他的遣词和表述当中很容易就能捕捉到他所指涉的历史语境。鲁惟一和尤锐或是追溯了“大一统”形成的政治历史背景，或是阐述了中国人塑造“大一统”的实际作为，但至少这两位汉学家都明确把“大一统”问题放置在相对具体的历史脉络中加以阐释。相比之下，如果“悬置”历史事实而把立论尽数依赖于已有的理论，则会使学术研究缺乏对历史的基本认识，而显得仅仅像是理论的演绎。^①

从这些汉学家的讨论中，不难感受到，作为西方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学者，即使接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在理解并准确认识“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文明时仍会遭遇许多疑难。例如薛爱华选取了一个看起来未必恰当的历史范本来阐述他理解的“大一统”，这使得他对于中国历史做出的整体判断失之偏颇。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因为他本人正是中国中古史研究的行家。相较于薛爱华，潜心研究中国秦汉史的鲁惟一固然认可“大一统”在历史上切实存在，但成长于不同政治文化中的他也深感无法从价值上理解作为历史现象和思想观念的“大一统”。

究其根本，当西方汉学学者试图将“中国”作为“案例”放置进西方人文学科的知识脉络中

^① 对于许田波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的批评，另可参考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赵鼎新的书评：《在西方比较历史方法的阴影下——评许田波〈古代中国和近现代欧洲战争及国家形成〉》，《社会学评论》，2006年第5期，第213—220页。

来分析和研究时，实则很难避免遭遇中国和西方如何进行比较的问题。当分析西方学者如何看待中国的时候，他们对中国历史在事实和价值上的误判或是不解仍是较为表层的矛盾，更深层的矛盾在于，西方的政治、历史经验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影响。显然，文明互鉴的视角给中国和西方的学者以无限的启发，最直接的表现便是在研究中大量地比照西方的历史经验。如果我们将这些西方汉学学者对中国古代“大一统”的判断与百年前中国学者借用西方现代历史学、社会科学视野研究中国历史的论断进行比较，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呼应。例如顾颉刚很早就意识到不能用秦汉奠定的框架去构想更早的疆域，进而揭示了“大一统”实则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系列兼并战争当中形成的“世界想象”^①。于是回看前面讨论到的尤锐和许田波的论述，他们同样处理的是顾颉刚早已谈及的问题，那就是为何中国在战国出现了“大一统”的理念，并且“统一”的政治架构最终在秦汉得以成型。吕思勉则在顾颉刚的基础上指出，在秦汉统一帝国的架构之下，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如何解决“华夷之辩”却成了政治的核心问题^②，因而吕思勉的看法则又恰恰与前文谈及的鲁惟一的观点不谋而合。

这说明以域外的经验考察中国的史实在中国和西方都不乏其例。近代中国学者经常参照西方历史评判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格局^③，这种研究视角的“不谋而合”恰恰揭示了这类研究背后的共同倾向，那就是习惯将中国作为“世界历史”中一个被动参与的对象，“世界历史”的模型仍旧以西方历史的发展为基础。同时也必须注意到，这种源于西方的“世界历史”模型，连同对于这个模型的解释，也处在一种不断行进的动态发展状态。这也是为何晚近30年来讨论“大一统”问题的总体趋势是一种从内部“解构”宏大叙事的主张^④，在这股思潮下，不少学者已经习惯于把“大一统”理念下的传统中国看成塑造近代民族国家的“叙事”甚至“想象”，从中反映出来的更多是西方学术界审视自身历史的新视角和新观点。考虑到这点或许便能理解为何一些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学者会有意识地拒斥、否认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

那么，使用以西方历史为前提的比较“模型”是否恰当呢？这是个更加复杂的问题。前文已经谈到，薛爱华和鲁惟一在讨论中国古代“大一统”问题时不约而同地参考了欧洲和美洲的情况，导致这两位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大一统”问题时，实际一直对此类疆域辽阔、族群多样、官僚体系庞大的古代帝国心存疑窦。许田波所使用的理论也基本脱胎自欧洲的历史背景，她除却参引了查尔斯·蒂利对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考察，还在文中大量援引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的研究，而沃尔兹的名著《人、国家、战争》当中所使用的历史模型正是修昔底德笔下的古希腊城邦政治。可是只消简单比较一下2000年前战国到秦汉时期的中国和城邦时代的古希腊，从疆域、政体、人口等探讨政治问题的基本前提出发，就能体会到“战国七雄”中的任何一个诸侯国在政治规模上都远远超过了修昔底德笔下的任何一个古希腊城邦。

深入而诚恳的“文明互鉴”历来很难。显然西方学者如何评判和理解自身的历史时刻影响他们如何看待和解释“他者”的历史，但也必须指出，本文涉及的几位汉学家都是从距离今天至少

① 顾颉刚，《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顾颉刚等：《古史辨（第二册）》，上海：上海书店（影印本），1982年版，第6—7页。

② 王铭铭：《土与大一统》，《中国社会科学辑刊》秋季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

③ 王锐：《重建中国历史的“大一统”叙事》，《东方学刊》，2019年冬季刊，第13—15页。

④ 同上，第15页。

1000多年前的历史语境出发来探讨他们对“大一统”的认识，其实最关键的问题经常被我们所遗忘。一方面，“大一统”作为一种政治体的基本特点之所以成为值得争论的学术问题，正是源于中国近代和其他文明、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碰撞。另一方面，当学者泛泛而谈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时候，似乎不应该忘记“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复杂而又多变的概念，因而不论是经由秦帝国统一的“秦中国”，还是处在汉唐之间被不同政权分裂、割据的“中国”，且不论这些构成了“历史模型”的具体历史阶段是否准确地契合了人们的历史想象，但至少“中国”在概念上的复杂性都很难使之与西方历史上的某些阶段构成简单直接而又“恰到好处”的对应关系。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